

立体呈现“大先生”形象性情

——评张梦阳《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

■刘金祥



《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
张梦阳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梦阳先生是国内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其耗费十几年心血写就的一百余万字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是近年来“鲁学”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许由于自己读过多部鲁迅传记，比较关注海内外关于鲁迅研究的动向和趋势，对这部体量庞大的《鲁迅全传》所表现出的心路梳理和精神剖析、历史考察与时代超越，有着一种特别的敏感和特殊的在意。质而言之，我被张梦阳先生这部巨著深深打动和强烈震撼了。

作者长于宏观架构和细节挾发，尤擅心理向度分析和精神层面挖掘，文笔激越酣畅，情感深挚凝重，使得由《会稽趾》《野草梦》和《怀霜夜》三部作品构成的《鲁迅全传》恰似一部灵魂跋涉的长诗，极富思想震力力和审美冲击力。作者对传主——“大先生”的深入探索和独特发现，对时代的深度切入和热切回应，连同其对自身的审视和超越，一起幻化汇聚成“激情之流”，堆积于胸中倾注于笔下。而这股激情之流又为作者找到了独特的语言表达策略——丰赡而富有力感，沉静而充满热情，直观而直逼本质。

作者始终正视传主灵魂中的深刻矛盾，既深切描绘其愤懑、激切的一面，又重笔状摹其宽厚、温婉的一面，把“大先生”亮色与阴柔的二元结构写成文化性格多重兼容的统一体。的确，鲁迅的性格和气度，历来是文化界议论最多的一点，这与许多当事人的记载与暗示密切相关。曾经对鲁迅谦恭执弟子礼而后反戈一击的现代作家高长虹，在《走到出版界》一文里，以亲炙者的口吻贬抑鲁迅为人刻薄、难

以相处。而对鲁迅褊狭性格发出同一声音的，又不止高长虹一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实乃处于十字路口的大变动大转折的文化，如同历史上发生任何文化迁变的时段一样，必然地将彼时全部重大矛盾与主题凝聚在某一特殊历史人物身上，鲁迅是极为罕见地跨越了传统文化、启蒙主义、民主主义直至革命思潮的独一无二的人物，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化的聚光灯便符合逻辑地聚焦在鲁迅身上，引来众多纷杂的操持各种观点的人们与之进行抵牾、辩诘甚至冲撞。鲁迅与当时文坛上很多人所发生的恩恩怨怨，究其根本是一个时代在文化上的裂变和重构所必然导致的精神价值的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以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试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雨如磐的政治环境下，鲁迅置身于天地之间，几乎是独立地抵御和支撑着身外重负与身内重压，虽然至为窘迫与极其艰难，终究卓然屹立、岿然不倒，如果没有信念力量的依托和希望盾牌的护持，是绝难独撑下来和坚守下去的。

张梦阳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鲁迅研究，谙熟鲁迅的身世遭际、文化身份和性格特点，因而在《鲁迅全传》中对传主的记述更为客观和全面，对传主的评价也更为公允和中肯。正是通过持之有故

的叙述和立论坚弥的阐释，使读者认同鲁迅的愤世缘于用世，鲁迅的决绝来自希冀，其精神世界令人心灵颤抖的悲愤与苍凉，是由异乎寻常的坚韧与高冷所催生所成就的。作为一位诗人气质的思想家，鲁迅令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深邃和奇崛在于此，易遭他们误解和曲解亦在此，令后人觉悟和警醒亦在于此。

《鲁迅全传》对传主的理解和言说也许有技术性的缺憾与不足，但却无法否认这部传记的精警与深刻。迄今笔者还没有读到哪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能如此酣畅淋漓地刻画出鲁迅活脱脱的形象和活生生的灵魂，如此精准

地描写出鲁迅骨子里“血脉偾张”与“温情脉脉”抵死相缠的一面，如此深透地状写与鲁迅呼啸战斗的英姿似乎截然相反而实际却是重要动因的一面，这使读者不仅惶然震惊于鲁迅灵魂的博大与高洁，而且又诧异惊诧于鲁迅内心的深邃与复杂。通读这部传记，读者最大的收获无疑是真正把握了作为弱者与强者的鲁迅，真正领略了鲁迅身上那带有阴柔色彩的现代文化心态，反映在传记中，作品氤氲着作者对传主的挚爱之情，充盈着作者对传主那愤激而绝望的灵魂的深深理解；而对传主的推崇敬重之情，即使是在对鲁迅作过高要求时也没有随处流露。文艺心理学表明，理智上对主人公的过高要求，正是情感上的不自觉认同，这是一种与人性对接的深层共鸣。昔时令鲁迅愤激和绝望的一切，在当下中国很难说已经完全绝迹了。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的今天，许多国民的人文素质还是如此低下，金粉迅速剥落，内囊依然丑陋，沉渣伴随市场大潮泛起，旧货披裹着新妆登场。面对这些鲁迅当年曾针砭批驳过的乱象，但凡真心关注人文生态环境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心平气和、从容淡定的。张梦阳先生身处社会转轨之交，为了像鲁迅一样吁求现代文

明尽快到来，深感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超越鲁迅那个时代的标准，在这本传记里，明显感觉和体会到作者强烈的反思意识和浓郁的人性观念，体现出作者思想倾向趋于更高境界的努力。

历史选择人和人选择历史往往相辅相成。在看不到希望之光，或者说在得不到价值确认的情况下进行反抗，是最为弥足珍贵的，比如鲁迅在失望苦闷中彷徨时，依旧没有放下手中武器，依旧用笔为枪顽强搏击，如同其在诗中所写：荷戟独彷徨。如果说前面是什么尚未得到确认，那么后面是什么对于从“待死堂”出来的鲁迅来说则异常清楚。所以，即便无路可走还是必须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最终追随中国共产党，历史地看其选择的正确性毋庸置疑更无可厚非，但，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心态下促使他作出这种抉择，却很少有人洞悉和知晓。在彼时彼境，这是一种对孤独绝望处境的本能突破，也是一种对反抗黑暗的同盟的刻意寻找，更是一种对自身奋斗价值的现时证明。笔者认为这部《鲁迅全传》最深刻之处在于：在一个与守旧传统进行果敢决绝抗争的文化斗士身上，不仅展现出我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与使命，而且袒露出人类知识精英普遍存在的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现实与理想、拯救与自救、超越与制约等各种因素永远相互纠缠的人性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的所有痛苦与绝望，他的一切选择与奋斗，在《苦魂三部曲——鲁迅全传》这部传记中几乎都得到了呈现和诠释。

出版界的“译林现象”

——李景端新作《风疾偏爱逆风行》读后

■黄源深



《风疾偏爱逆风行》
李景端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你不能不承认，李景端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一个前半生与翻译出版无缘、在译界更无任何人脉的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化界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里，赤手空拳与强大的极左思潮搏击，高举历来被无端贬损的通俗文学的大旗，办起了大型外国文学杂志《译林》，引发连印几十万册还不够卖、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并使杂志迅速成为享誉文坛的著名品牌。而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看准时机，创办了与杂志同名的“译林出版社”，自出机杼。在推出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的同时，出版了大量高质量高品位的世界文学名著，包括难读如天书的现代派艺术精品，令学界为之震动，也大大提高了出版社的文化软实力，使其在翻译出版领域的最强阵营中，站稳了脚跟。近年来译林出版社更连续八年经济收入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之首位，其发展之速，曾被媒体誉称“译林现象”。

由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李景端新作《风疾偏爱逆风行》，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出版界奇迹发生、发展的过程。他写的虽是《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却勾勒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李景端和译林出版社（包括《译林》杂志）的经历，可谓整个时代发展的缩影。

时势造英雄。改革开放大局的总体向好，国家政策的诸多柔性变化、人文环境的日渐宽松、大众审美趣味的多元趋向等等，都为李景端在出版事业上的锐意进取，创造了成功的条件。“《尼罗河上的惨案》风

波”，是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例证。《译林》刊载的这部通俗小说，涉及当时被视为异类的凶杀和探案题材，受到了一位外国文学界前辈的严厉批评和举报，并惊动了有关部门。但在当时文化政策已经显现宽松迹象的形势下，主管《译林》的负责干部并没有像往昔那般“闻风而动”，顺势组织对《译林》的批判；有关部门更是扭转了“宁左勿右”的惯性思维，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对小说的出版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而广大读者则根据自己的审美直觉，对作品显示出巨大热情，以审美实践对小说做出了肯定的评价。逐渐形成的良性文化生态大环境，以及李景端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终于使这一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并在整个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以及新生的《译林》，一定程度上成了外国文学界对待通俗文学态度的转折点。渐渐地，人们不再用鄙弃的老眼光看待通俗文学了。以此而论，李景端和《译林》功不可没。当然，正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造就了《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以及它们的主编、总编辑兼社长李景端。

读过《风疾偏爱逆风行》的人，都会认

为李景端是个奇人。他接手出版工作时，并没有相关从业经历，对出版却有着独到的眼光，能够见他人所未见，识旁人所未识。就以出版现代派小说《尤利西斯》为例，一般人都认为，这部小说表现手法离奇，文字艰涩，译者翻不好，读者看不懂，即使上市，也很少会有人问津，结果肯定是一笔花足力气、却得不到回报的赔本生意。但李景端却不这么看。他洞悉这部作品在中国出版的真正意义，认为即使缺乏市场，也具有文化补缺的学术价值。他以巨大的胆识，坚定地开启了《尤利西斯》的出版工作，而他在决定要做一件事之后，往往有一种百折不回的韧性。

为了寻找这部“奇书”的译者，他接触了一切可能接手的学人，亲自找上门去，诚恳邀约，动之以情。一次次被婉言谢绝，铩羽而归；又一次次另觅出路，从头再来，继续以他的坦率和真诚去“敲门”。也正因为他是一个热情坦诚，能为朋友赴急难的人（曾主动替季羨林等名家打维权官司），所以恰如本书中描述的那样，能结交诸如冰心、钱锺书、杨绛、季羨林、萧乾、叶君健、王蒙、余光中等多位文化界大腕，并最终打动了萧乾和文洁若夫妇。两人以老迈

之躯，接受了这份几乎人人望而生畏的翻译工作，出色地奉献出了被世人敬为“天书”的《尤利西斯》中文译本。

到此为止，人们以为大功告成，这件事已经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李景端却不然。他围绕译著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召开新书发布会、组织签名售书、举办有中外学者参加的《尤利西斯》大型学术研讨会、投入“两个译本之争”……积极采用宣传手段，闹出很大动静，使一部译著竟同时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并成为国内文化界的一个热点，一时人人争而得之，以致出版社不得不反复加印，出现了冷门书成了热销书的奇迹。你不得不佩服李景端。

《风疾偏爱逆风行》用生动的事实说话，不加虚饰，借助亲身经历，刻画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的变化和发展，更有诸多名家珍贵信札及趣闻逸事，值得一读。